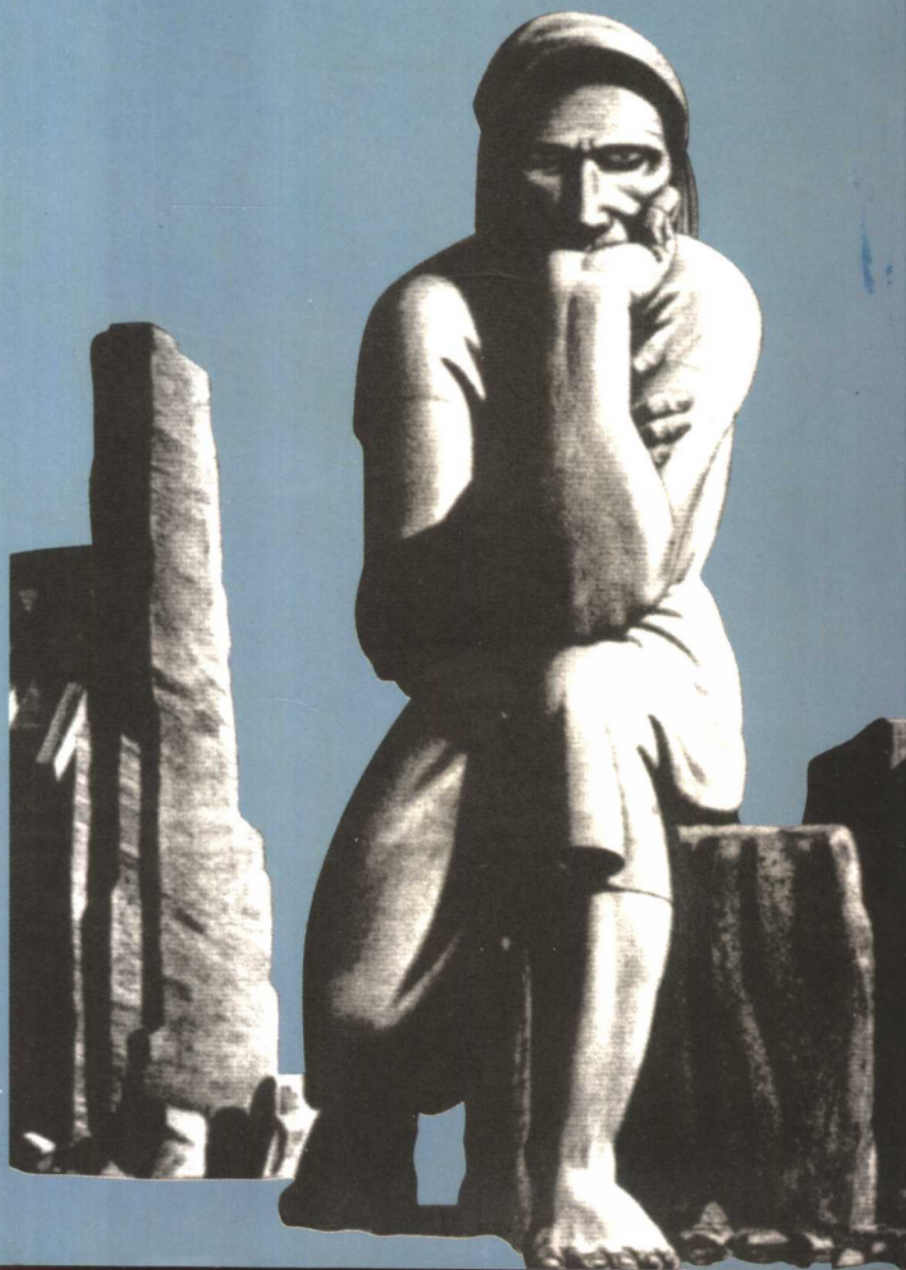


荒原
学术
文丛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吴义雄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荒原
学术
文丛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
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责任编辑：卢家明

姚沙沙

封面设计：陈瑾

责任技编：肖作勤

ISBN 7-5406-4327-7



9 787540 643270 >

定价：28.00元

致 读 者

——《荒原学术文丛》序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
只有岩石，没有水，一条砂路
蜿蜒而上，绕进群山

……

——艾略特：《荒原》

千沟万壑，白骨残垣，
 诉说百年荒诞，千年坎坷。
岩巉苔滑路难行，
 可有飞登捷径？
不屑随风上云端，
 无意攀高附势。
冷眼睥睨，凿石斩棘，
 险地放歌，谷底行吟，
 别有豪情韵味。
鸦噪犬咬助兴，
 荒原约会，
 相顾一笑，
 自由之最是心声。

袁伟时

1998年7月15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吴义雄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3

(荒原学术文丛/袁伟时主编；金炳亮策划)

ISBN 7-5406-4327-7

I. 在… II. ①吴…②金… III. ①新教-传教-研究-中国-近代②新教-传教士-影响-社会-中国-近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881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125 印张 453 000 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5406-4327-7/B·15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陈 胜 彝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有关论著不断发表、出版，表明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颇有进展的学术领域。但人们也不难注意到，由于各种原因，从总体上来看，在这方面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为数不多；真正有突破性的专题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吴义雄的这部专门探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活动的著作的问世，无疑是传教士研究领域中一项很值得珍视的新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必将产生十分有益的推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 19 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活动，即新教在华传播开端阶段的历史。对这段历史有关的各方面学术问题，国内学术界或是迄今未曾论及，或只有局部、片段的了解；境外、国外的一些有关著作，或是资料不够完备，或是因信仰、观念上的原因而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别有侧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撰著本书的动力，显然来自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因此，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作者既注重对具体史实的仔细考察，也注重从理

论的层面讨论一些比较重大的宏观问题。例如，作者尽可能细致地讨论了英美各新教差会来华活动的起源，也从中外关系总体演变的角度探讨了传教中心由南往北转移的历史趋势；（见本书第 203—209 页）既对“罗孝全索赔事件”这类国内学术界甚少提及的重要事实作了集中的研讨，（第 270—280 页）也从理论上说明西方各界对“开放的中国”的一致愿望在传教士言行中的体现。

我曾多次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 这段名言精辟地揭示了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之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新的材料，或者不能达到对原有材料成功地进行新诠释的境界，则很难取得真正的学术进展。多年来，制约传教士问题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不易获得新材料。而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在于运用了大量国内学术界以往未曾知见的材料。吴义雄同志利用到国外访问研究的机会，四处访求与本课题相关的史料，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十分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其中如传教士的日记、信件，传教差会的档案，当时的宗教期刊，传教士的著作，他们及后代教会人士所修史书，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等等，很大一部分为国内学界所罕见或未见。这些材料，约 80% 以上为英文资料，其中有些是手稿。在中文资料的搜寻运用方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流传的传教士中文作品，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期刊，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多的运用。

以这样宏富的新材料为基础，作者就能以较为宽阔的视野，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以往人们对于

^①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6 页。

新教传教士来华的起源和初期活动的历史，每每语焉不详，甚至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而本书则能依据大量的原始材料，对 19 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和世俗活动的各个方面，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作者在讨论美国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开端时，使用了美部会的档案，及美国公理会所办的月刊《传教先驱》（*Missionary Herald*），从上千件原始文档和长达 20 余年的杂志中，梳理出该会传教士如裨治文、伯驾、雅裨理等各种活动的细节。又如，对罗孝全这样一个传教士，以往国内学术界主要注意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关系，对他的传教活动则甚少提及。本书作者依据与罗孝全关系密切的《中国传教呼声》（*China Mission Advocate*）和美国浸礼会的刊物《浸会传教杂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以及美国学者尚未公开出版的成果，对罗孝全和美国浸礼会其他传教士的活动，作了详细的描叙。（见本书第一、二章）再如，中外学者都注意到，新教传教士在从事宗教活动之余，还在引进西学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潮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风靡了晚清知识界的巨著，都不同程度地以传教士的有关中文著述为资料基础。但传教士从事这种著述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本书指出，他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是为了消除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的观念，以扫清传播基督教的思想障碍。而如此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便是一本集中阐述这种观点的名为《是非略论》的小册子，作者是德籍传教士郭士立。（有关内容见本书第五章）以上只是从书中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在本书中，还有许多内容是以这样的罕见史料为基础的。

在今日资讯发达的时代，真正鲜为人知的秘籍珍本，已越来越少。认真研读已知的文献，从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使

旧材料变成新材料，是治学的必经之途。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传教士问题的不少学者，都知道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价值，也不乏使用者。但像吴义雄这样下苦功通读了全部《中国丛报》20卷、多达1万多页内容的，恐怕极少。正因为他对这部近代早期中外关系的资料库作了细致的研读，一些有相当难度的学术问题便在本书中得到了解决。例如，熟悉近代早期中外关系的学者都了解，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文化交往中，马礼逊学校、“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等，都是很重要的机构。但其具体情况如何，它们的开端、演变过程、最后结局怎样，则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本书则以《中国丛报》各卷刊载的这些机构的文献资料为主，参考其他材料，对这几个机构作了迄今为止最为透彻的研究，以大量的事实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制作的“1835—1850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医院情况简表”、“马礼逊学校课程情况表”、“新教传教士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表”（分别见本书第309—310、351—352、511—513页）等，尤具学术价值。这样，《中国丛报》的资料价值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本书涉及到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多个方面。要驾驭这样复杂的研究课题，除了较好的英文水平和过硬的史学功底外，还需要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认为，本书的若干重要观点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既普遍谴责鸦片贸易“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身体”，“将他们引入墓地”（本书第238页），又在鸦片战争中欢呼英军野蛮的进军，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第244页）。如何理解这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态度？作者在如实论列了传教士的两种观点后指出，传教士谴责鸦片贸易是从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出发的，而他们对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在道德意识和传教

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在结语部分，作者对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的统一性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他认为传教利益和传教动机是新教传教士将活动范围延伸到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最重要原因。这一论点，也是建立在大量客观史实之上的，得到了不少知名学者的赞同和肯定。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本书无疑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新著。她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提升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

吴义雄曾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山大学工作多年。1995至1999年，已经是副教授的吴义雄以在职博士生的身份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他不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史学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具有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他一贯勤奋刻苦，实事求是，从不夸夸其谈，可以说是一位既有较深厚的学问功底，又具有良好学术道德的优秀年轻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多位著名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四载苦读，结出了堪称丰硕的果实。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写下上述的感想。是为序。

2000年新春于广州康乐园

目 录

序	(1)
绪论 学术史的回顾	(1)
第一章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传教活动	
(上) (1807—1840)	(24)
一、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背景	(24)
二、马礼逊来华及其活动	(32)
三、伦敦会传教士与恒河外方传道团	(45)
四、美部会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活动	(63)
五、欧美其他新教教派势力之东渐	(89)
第二章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传教活动	
(下) (1840—1851)	(114)
一、清廷对传教活动的初步弛禁	(114)
二、澳门—香港—广州	(140)
三、传教活动中心的北移	(187)
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	(210)
一、马礼逊、郭士立与“中国的开放”	(211)
二、在道德与利益之间：新教传教士论鸦片贸易 与鸦片战争	(234)
三、伯驾、裨治文与中美外交关系的开端	(249)
四、寻求新的权益：新教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的 中西关系	(262)

第四章 传教事业与新教传教士的医务、教育活动	(291)
一、“医务传道”方法及其实践	(292)
二、来华新教传教士教育活动的开端：英华书院 ...	(318)
三、马礼逊教育会与马礼逊学校	(336)
第五章 宗教传播与知识引进：新教传教士的中文 著译活动	(358)
一、早期的《圣经》中译和其他传道书的印行	(358)
二、更新观念与输入知识：新教传教士的中文 著述	(395)
第六章 新教传教士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	(435)
一、报道和研究中国的新群体——新教传教士	(436)
二、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452)
三、新教传教士与早期西方汉学	(480)
结 语	(516)
附录一 1807—1851 年来华新教差会和传教士名录	(525)
附录二 参考书目	(539)
附录三 人名索引	(554)
后 记	(567)

绪论 学术史的回顾

近代中国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是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而且迄今未有定论。当我们思考现代生活及其演变的速度为什么与一个半世纪以前有如此重大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互相歧异的解释在中外学术界导致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多种学说体系的出现。引起种种歧异的原因，从学术上来看，除了研究者本身在信仰、经验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千差万别外，一个显著的因素是在具体史实研究方面存在诸多欠缺。由于我们对许多事件、人物及其演变的过程缺少全面而清楚的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便因各有侧重而众说纷纭。

审视 100 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基督教传教士曾经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几乎在近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印迹。他们在中外关系、宗教、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其他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专题研究尤为缺乏。本书选择“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弄清鸦片战争前后 40 年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各

方面的基本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以考察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初期阶段，新教传教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各种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诸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由于这个时期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初期阶段，对此进行细致的研究，还可以为讨论以后各阶段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提供清晰的历史背景。

笔者认为，从 1807 年伦敦会的马礼逊到广州，到 1851 年新教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停刊，是近代新教在华传教运动以广州为中心的阶段。不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界划分研究阶段，是因为在笔者看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应过分注重政治事件的象征意义，而应尊重新教在华传教史自身的规律。选择 1851 年为本书研究在时间上的下限，理由如下：其一，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是新教传教士的活动的主要范围，到 1850 年前后，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新的新教对华传教的中心。广州作为新教传教中心的时代的结束，以《中国丛报》的停刊为标志。其二，这种传教活动中心转移的过程，与近代中外关系中心转移的过程同步，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因此，传教活动中心的转移反映了中外关系演变的一种规律。其三，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的活动在法律上仍属非法，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并没有规定中国在宗教上向西方“开放”，因此这个战争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对华传教运动进入新的时代。其四，新教传教运动的成效，也与传教活动中心转移有明显的关系。根据有关统计，1842 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吸收的比较正规的教徒仅为 6 人，在这之后的几年也没有大的进展，从笔者见到的资料看，在 1850 年之前，各口岸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均进展甚微。但在 1850 年之后，吸收教徒的人数直线上升。1854 年，中国教徒的总人数为 350

人, 1865 年为 2000 人, 到 1876 年, 达到 13035 人。^① 本书所研究的这个时期, 是新教传教士探索传教方法、积累经验和积蓄力量的时期。因此, 以 1851 年为研究的下限, 也符合新教在华传教史的阶段性特征。

100 多年来, 中外学术、宗教界均已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以下将对有关研究情况作简要的回顾, 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基础。

一、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的研究状况

教会修史与中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史研究

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的时间比较晚。梁廷枏的《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提到一些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情况, 对新教则全无记载。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文著作, 是王元深的《圣道东来考》。^② 王元深 (王宠惠的祖父) 曾是郭士立创立的福汉会的成员, 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他在 1899 年撰写了《圣道东来考》, 1907 年在香港出版。这本小册子, 以记述礼贤会在广东的活动为主, 兼及其他新教教派在广东的初期活动, 所涉及到的教派有: 伦敦会、美国浸礼会、美部会 (书中称为纲纪慎会)、英国安立甘会 (书中称安立间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卫斯理会 (书中称惠斯理会)、福汉会、礼贤会、巴色会、巴陵会、德国小巴陵会, 卷首和卷末分别有《景教东来考》和《天主教东来考》。书中最有价值的

^① *Record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1890, p. 735.

^② 该书复印件及《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香港教会掌故》一书, 承香港基督教文化协会会长李志刚牧师奇赠, 谨此致谢。

部分是《德国礼贤传道会入粤记》，几乎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对礼贤会 19 世纪后期在广东活动的叙述比较详细，因作者本人即会员，他所提供的细节是难得的研究资料。他对福汉会情况的叙述，虽篇幅不长，但也提供了一些内部的情况。该书对其余各派在华早期传教活动的记述虽极简略，但亦具参考价值。

190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赉的《中国耶稣教会小史》，作为《布道小丛书》的第 4 种。作者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追溯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然后分 4 个阶段简单地叙述 1807—1907 年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经过，其中第二章《教会立基时代》和第三章《教会萌芽时代》，就 1807—1842 年和 1842—1860 年新教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简略的纲要。这本小书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一部关于新教在华活动的专门著作，由于对景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史也有叙述，故可以将它看作简明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它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 20 世纪前期教会修史的风气。

1920 年，温国符编辑、邝柳春校订的《西广东长老会历史》，由启明公司承印出版。这本小书对美国长老会在广东传教以及广东本土长老教会的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其中第三章《论长老会传至中国》，对早期长老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有一点记载。

1924 年秋，《神学杂志》第 10 卷第 3 号出了一期特刊，名为《中华基督教历史》，由冯玉祥题写书名。该刊叙述各新教差会的简况，侧重于当时的情况，对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礼贤会等新教差会来华活动的起源也分别在各部分的开头提及。

1934 年，在广州等地活动的浸信会牧师刘粤声出版了《两广浸信会史略》一书。这是关于浸信（礼）会区域活动史的第一部著作。作者对叔未士、罗孝全等早期浸礼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南方浸信会的活动，以及两广本土浸信教会的发展，都有较概括的叙述，有的内容较为详细。刘

粤声在广州沦陷于日军前后到香港，于1941年又出版了《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1940年4月，“香港基督教联会”开会决议，编写《香港基督教会史》，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编写，以刘粤声为主编，同时向教友征求资料和文稿。到1941年7月，该书完成。全书分为7个专题，其中第一章《会宗史略》介绍公理宗、信义宗、浸信宗、圣公宗和循道宗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起源，第七章《个人传记》为马礼逊、裨治文和叔未士等人立传，均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新教传教士在华南地区的早期活动。^①

1936年，女教徒余淑心等编纂的《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由福州仓前上梅坞知行印刷所印行。其书卷一《布道志》中的第一章《布道之缘起》和第二章《布道开创时代》，很简略地回顾了美以美会派遣传教士到福州的开端，以及该会传教士在福州的初期活动。同年，同样由女教徒吴立乐主编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由上海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刘粤声作序。该书是同类书籍中部头较大的一种，共234页。在每一部分的后面，附有与正文有关的问答题，此乃仿效欧美同类著作的做法，供教徒修习之用。作者按地区叙述浸礼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中华南、江苏（含上海）和华东（浙江、福建）几个部分，涉及到本文研究的范围，对叔未士、罗孝全、晏玛太等的早期活动的叙述相对来说比较详细。

1940年，时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王治心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是一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通史。全书分为22章，叙述自唐代景教到晚清以后各大教派在中国活动和传播的历史，其中有3章涉及到本书研究的范围，即《更正教输入中

^① 该书复印件及《中国基督教史纲》、《港澳澳名牧生平》等书，蒙澳门蔡高纪念中学校长潘乃昭牧师寄赠，谨此致谢。

国的预备时期》、《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和《道光以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动》。书中所说的“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作为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各章单独来看，均显单薄，也较少专题性的讨论，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入门的途径。书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全从教会的立场出发，因此，该书仍可归入教会修史的范畴。

教会修史的风气，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夕。1947年，上海中华浸会书局还出版了“上海第一浸会堂”所编的《上海第一浸会堂百年史略》，专以浸会在上海的发展演变为内容。其中“史略”、“年表”两章对叔未士、啤士等人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上海的传教经历有所叙述。

1949年前由教会人士所撰写、编著的上述书籍，本身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还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可以提供新教各教派在华活动的历史与现状的纲要和概况，供一般性了解之用，也可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帮助，但一般不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大都很简略。披览之余，还可以发现，各项著述在叙述同样的史事时，均大同小异，且时有错漏之处。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在较长的时期内中断了对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1950年由上海浙沪浸礼议会出版的《华东浸会百年史》，可能是解放前教会修史的余音。自此时直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反洋教运动的研究，代表作是李时岳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一是着重于揭露、批判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侵略。“文革”开始后，传教士问题更成为学者的禁区。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基督教在华